

中东国家在菲律宾南部和平进程中的作用

孟庆顺

内容提要 在菲律宾南部和平进程的不同阶段，中东穆斯林国家扮演了摩洛哥穆斯林的支持者、双方谈判的中介者，以及全面和平的推动者等角色。它们成功地促成菲律宾南部局势从战乱转向和谈、从纸上和平转到实际和平，并促使菲律宾南部由局部和平向全面和平过渡。中东国家所以能发挥这样的作用，原因在于中东穆斯林国家和菲律宾的各自实力地位、原则立场，以及由菲律宾灵活外交策略促成的相互间良性互动关系。

关键词 中东国家 菲律宾 穆斯林 摩洛哥人 和平进程

作者简介 孟庆顺，中山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广州 510275）。

菲律宾是一个天主教徒为主体的国家，穆斯林只占全国人口的 5% 左右。绝大多数穆斯林居住在菲律宾南部（下称“菲南”）的棉兰老地区，以“摩洛哥人”著称。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初菲南冲突的高潮期，摩洛哥人同天主教徒不断发生暴力冲突，他们建立了反政府的分离主义组织——“摩洛民族解放阵线”（下称“摩解”），试图以暴力方式将棉兰老地区从菲律宾分离出去，建立独立的摩洛哥人国家。中东穆斯林国家积极推动菲南穆斯林与政府举行和平谈判，并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问题尚未引起学界关注，国内尚无专文论述，国外也未检索到专门论文。笔者试就此作粗浅分析，以期与学界探讨。

中东国家在菲南和平进程中的角色

在菲南冲突初期，中东国家是摩洛哥穆斯林的同情者和支持者，站在摩洛哥人一边，试图用各种手段向菲律宾政府施压，为和谈创造条件。中东国家主要采取了三方面的行动：

1. 关注摩洛哥穆斯林的困境，向他们提供各种支持。当菲律宾发生基督徒与穆斯林大规模流血冲突的消息传出后，中东穆斯林国家，尤其是利比亚、沙特阿拉伯和埃及非常关注，并对菲南穆斯林进行声援或物质援助。1971 年 6 月，在北哥达巴托的马尼利村，六七十名摩洛哥穆斯林在清真寺被杀害。这一惨案引起利比亚的强烈反应，率先将该事件提交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在其他穆斯林国家代表的支持下，利比亚谴责菲律宾政府实行集体屠杀，迫害宗教少数派。菲南冲突同样引起埃及民众和政府的关注，1972 年 9 月，爱资哈尔大学校长谴责菲律宾对穆斯林进行“集体屠杀”，呼吁穆斯林政府出面帮助他们的穆斯林兄弟。6 天后，萨达特总统宣布，埃及已给菲律宾穆斯林运送了一船紧急援助品。1973 年，在班加西召开的第四次伊斯兰国家外长会议上，会议东道国利比亚建议讨论改善菲南穆斯

林处境的途径和方法。¹

2. 为“摩解”提供政治、经济、军事支持。中东穆斯林国家认为“摩解”代表了菲南穆斯林的利益，因而从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对该组织予以大力支持。“摩解”正式在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建立了中央委员会，远距离指挥国内的反政府活动，并寻求穆斯林世界的帮助。利比亚、沙特及其他穆斯林国家向“摩解”提供了大量资金。据统计，1972~1975年，利比亚和伊斯兰会议组织共向“摩解”提供了约3500万美元的援助。^④海湾国家为菲南穆斯林提供了大批武器，中东一些国家还为“摩解”武装人员提供了军事训练场所。^④

3. 独自或以伊斯兰会议组织的名义与菲律宾官方接触，实地调查菲南穆斯林的遭遇，并提出政治解决的思路。1972年，埃及和利比亚先后派出代表团访问菲南地区，了解当地穆斯林的实际情况。1973年第四次伊斯兰国家外长会议通过决议，由利比亚、沙特、塞内加尔、索马里组成四方部长会议，调查“菲律宾穆斯林的困境”。1974年6月举行的第五次伊斯兰国家外长会议通过了第18号决议，督促菲律宾政府与“摩解”领导人用政治与和平手段解决摩洛问题。

在菲律宾政府和“摩解”处于相持阶段、双方都认识到无法完全消灭对方时，中东国家充当起双方谈判的调停者和中介者。在中东国家及其他伊斯兰国家的努力下，菲律宾政府与“摩解”终于走到谈判桌旁，并在1976年12月23日签署的黎波里和平协议。“摩解”宣布放弃独立的目标；菲律宾政府则允许摩洛穆斯林在棉兰老建立自治区。在协议谈判过程中，利比亚发挥了关键性作用：菲律宾马科斯总统夫人在访问利比亚期间与卡扎菲会晤直接促成了菲律宾政府与“摩解”的谈判；双方间的多次谈判均在的黎波里举行，双方谈判由利比亚总人民委员会外交秘书（外长）主持，四方部长会议代表及伊斯兰会议组织秘书长列席。^¼利比亚的特殊作用在和平协议的签字仪式上也得到体现，利比亚作为伊斯兰会议组织菲律宾委员会的主席，也作为见证人签署了该协定。^½

由于菲律宾政府与“摩解”对协议的理解有很大差异，的黎波里和平协议陷于失败，双方恢复对抗状态。中东国家把握一切机会，希望能推动菲律宾政府与“摩解”双方重新谈判。1986年，阿基诺夫人当选为菲律宾总统后，表示愿与摩洛分离主义分子举行和谈。利比亚、沙特等中东国家答应帮助劝说“摩解”回到谈判桌旁。1986年8月，阿基诺夫人的小叔子参议员阿加皮托·阿基诺与“摩解”领导人密苏阿里在沙特会晤。经多次商谈，1987年1月3日，双方达成《吉达协定》。菲律宾政府答应给予摩洛人更大的自治权，并力促穆斯林地区的振兴；“摩解”则放弃完全独立的要求。这一协定同样未能贯彻实施，和平进程再次陷于停顿。1992年，拉莫斯成为菲律宾总统后，和谈出现转机。同年10月，包括利比亚、沙特在内的伊斯兰会议组织菲律宾委员会积极进行斡旋，促使菲律宾政府与“摩解”在的黎波里举行预备性会谈，随后的谈判取得重大进展。1996年9月2日，双方签署了“全面实施的黎波里协议的最终协议”，双方同意立即在菲南建立穆斯林棉兰老自治区，在穆斯林占多数的地区实行自治。可以说，双方最终协议的达成离不开中东国家的帮助。从谈判的启动到谈判中一系列难题的解决，都有赖于这些国家的居间调停。有学者将伊斯兰会议组织在谈判中的作用概括为“作为准会谈一方、质询、调停、磋商、区域安排、制裁、甚至准谈判（伊斯兰会议组织对菲律宾政府、伊斯兰会议组织对“摩解”）、作为会议的主道主、推动谈判、停火及达成协议后的

¹ See Moshe Yegar, *Between Integration and Secession: The Muslim Communities of the Southern Philippines, Southern Thailand and Western Burma Myanmar*, Lanham: Lexington Books, 2002, p. 256.

^④ W. K. Che Man, *Muslim Separatism: The Moros of Southern Philippines and the Malays of Southern Thail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140.

^④ See Merliza M. Makinano and Alfredo Lubang, *Disarmament, Demobilization and Reintegration: The Mindanao Experience*, The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Canada, February 2001, p. 17.

^¼ See W. K. Che Man, *op. cit.*, pp. 146-147.

^½ See Sa'ad S. Khan,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Islamic Conference (OIC) and Muslim Minorities", *Journal of Muslim Minority Affairs*, No. 2, 2002, p. 355.

监督、动员国际支持等”¹。在参与谈判的伊斯兰会议组织成员中，起主导作用的是中东国家，可以说，没有中东国家的努力，就没有最终协议。

最终协议正式生效后，中东国家在菲南和平进程中的角色也发生相应变化，变为和平协议的维护者和全面和平的推动者。对于来之不易的和平协议，中东国家尽力推动协议的实施。它们与其他穆斯林国家一道向棉兰老穆斯林自治区提供所需的政治、经济支持。1996年第24届伊斯兰国家外长会议和1997年第八届伊斯兰首脑会议都对和平解决菲南问题表示满意，伊斯兰会议组织在向菲律宾穆斯林表示祝贺的同时，也接受了自治区首脑密苏阿里帮助重建的请求，呼吁成员国扩大对穆斯林棉兰老自治区的物质帮助。^④这一呼吁得到穆斯林世界的响应，1998年下半年，伊斯兰发展银行答应向穆斯林棉兰老自治区提供1600万美元经济支持，又联合其他机构再提供1360万美元援助。^④“摩解”与菲律宾政府和谈引起该组织内部的分裂，以副主席萨拉马特·哈希姆为首的强硬派从“摩解”分裂出来，成立了“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组织（下称“摩伊”），并在短期内发展为一支实力强大的武装力量，坚持在菲南建立独立国家的目标，不承认“摩解”与政府方面达成的和平协议。中东国家一方面支持穆斯林棉兰老自治区的正常运作，另一方面与东南亚穆斯林国家一道鼓励菲律宾政府与“摩伊”进行和谈，通过政治谈判实现菲南的彻底和平。1997年，菲律宾政府与“摩伊”签订全面停火协议。2001年，在的黎波里举行的菲律宾政府与“摩伊”第一轮正式会谈中，双方签订的黎波里和平协议，规定各方要遵守1997年停火协议，并确定了实质性谈判的主要议程。中东国家尤其是利比亚作为伊斯兰会议组织成员国参加了实现停火的国际观察团，与本地观察团一道参与停火联合协调委员会的工作。

中东国家对菲南和平进程的重大影响

中东国家对菲南和平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具体表现在下列3个方面：

（一）促成交战双方谈判和菲南局势从战乱转向和谈

在20世纪70年代初摩洛穆斯林分离主义运动的高潮期，菲南成为炮火连天的战场。“摩解”武装人员迅速发展到了1.5万~3万之间，该组织宣称50%以上的摩洛人支持“摩解”的事业。^{1/4}受“摩解”控制及影响的区域遍及棉兰老各地，苏禄群岛的绝大部分和巴西兰岛的2/3以上也曾掌握在摩洛人手中。为了遏制摩洛分离主义势力，菲律宾政府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1974年在南部部署的军人为3.5万；1975年增至25万，占菲律宾军队总数的75%。军费预算比1972年军事法实施时增长了3倍，1975年达3.25亿美元。双方战火造成大量无辜平民伤亡，据估计，到的黎波里协议签署前后，已有五六万到十二万军民死于战乱，无家可归、流离失所者达20万~30万，有人甚至认为难民人数逾百万。^{1/4}

正是中东国家的外交努力促使菲南对立双方从军事对抗转向和谈。中东国家对于菲南问题的立场是要求用政治手段公正、持久地解决摩洛问题。1974年6月在第五次伊斯兰国家外长会议上，利比亚外长公开承认利比亚向摩洛反叛者提供了资金、武器和弹药。他表示，利比亚会继续提供帮助，并用一切手段，包括石油禁运，以保证用政治方法解决摩洛问题。以和平手段与“摩解”代表寻求政治解决方法，也正是第五次伊斯兰国家外长会议第18号决议对菲律宾政府提出的要求。^{3/4}1975年7月，在吉达召开的第六次伊斯兰国家外长会议正式承认了“摩解”作为菲律宾穆斯林代表的身份。

¹ Merliza M. Makinano and Alfredo Lubang op. cit., p. 36.

^④ See Sa'ad S. Khan op. cit., pp. 357 - 358.

^④ Eleanor D. Ictaan - Bang - oa "The Question of Peace in Mindanao, Southern Philippines", in Chandra K. Roy, Victoria Tauli - Corpuz & Amanda Romero - Medina ed., *Beyond the Silencing of the Gun*, TEBTEBBA Foundation, Baguio City, Philippines 2004, pp. 160 - 161.

^{1/4} W. K. CheMan op. cit., p. 83.

^{1/2} Moshe Yegar op. cit., pp. 299 - 276.

^{3/4} See Moshe Yegar op. cit., pp. 286 - 287.

与此同时，中东国家坚持任何政治解决方法应尊重菲律宾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第五次伊斯兰国家外长会议不接受“摩解”从菲律宾分离出去、建立独立国家的要求，身在吉隆坡的“摩解”代表也未获准参加在该市举行的会议。伊斯兰国家外长会议组织的这一原则立场为和谈提供了可能，1974年，伊斯兰会议组织秘书长穆罕默德·哈桑·托哈米应邀访问菲律宾，说服菲律宾政府参与和谈。次年1月，菲律宾政府与“摩解”在吉达正式展开和谈，最终在黎波里的会谈中取得突破。

的黎波里协议的实施一波三折，半途而废。然而，该协议仍给饱受战乱影响的菲南民众带来了和平的希望，开始了菲南局势由战乱走向和平的过渡。对和平进程失望的“摩解”虽然在1978年宣布重新回到要求独立的立场，并与政府军进行军事对抗。但由于国际监督停火的尝试，以及政治解决的国际压力持续存在，此后的军事活动不论是规模上还是频率上都远远无法同以前相比。

(二) 促成摩洛穆斯林的自治，实现了菲南从纸上和平转到实际和平

中东国家促成的黎波里协议为和平解决菲南冲突奠定了基础，按照该协议规定，菲律宾政府答应为摩洛穆斯林在菲南13省建立穆斯林自治区，内政由穆斯林自管；外交事务由菲律宾中央政府掌管。双方立即停火，由伊斯兰会议组织派出代表协助监督。但在实施协议的过程中，菲律宾政府提出，如何自治，以及哪些地方属于自治区范围应通过公民投票决定。由于在相关省份穆斯林人口只占总人口的20%左右，天主教徒则占80%，公民投票很难得到“摩解”满意的结果。在多数穆斯林抵制投票的情况下，绝大部分参加投票者反对将13省并入一个由“摩解”领导的自治区，马科斯总统提出的建立两个自治区的计划获得通过。菲律宾政府据此在菲南设立了第九和第十二自治区，并自认为已履行的黎波里协议。¹“摩解”认为，协议本身并没有公民投票的规定，菲律宾政府完全违背了的黎波里协议。

面对菲律宾政府与“摩解”的争执，中东国家多方作出努力，试图打破僵局。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与马科斯总统多次通过信件交换意见，并与马科斯夫人会晤就有关问题达成协议，但在具体执行中都没能解决问题。1977年4月，菲律宾政府举行公民投票后，伊斯兰会议组织派出一个包括该组织秘书长、利比亚外长在内的17人代表团，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同“摩解”恢复与政府会谈，希望解决分歧。双方均拒绝对方的妥协方案，会谈陷于破裂。伊斯兰会议组织公报宣布，因菲律宾政府的消极态度和违反先前的协议，谈判陷于失败。为加大对菲律宾政府的压力，该组织决定给予“摩解”在伊斯兰会议组织的观察员身份。此后，该组织的年度会议基本都要重申通过谈判实施的黎波里协议的主张。^④阿基诺夫人当政后，愿通过谈判实施的黎波里协议，但最终还是无法越过公民投票这一障碍。直到1996年菲律宾政府与“摩解”达成最终协议，才解决了双方面临的重大难题。该协议规定分两个阶段实施和平协议：在为期三年的建立信心期，设立由“摩解”领导人密苏阿里领导的和平发展特区；三年后将在这些省份举行公民投票，以确定他们是否加入自治区。^⑤根据该协议，7500名“摩解”武装人员并入军队和其他安全部队，“摩解”领导的自治区政府也正式运作。尽管穆斯林棉兰老自治区还存在种种问题，但如拉莫斯总统所说，协议“终结了持续近30年、导致12万多菲律宾人死亡的冲突”，迎来了“菲南和整个菲律宾和平发展的新时代”^⑥。

(三) 促成并监督“摩伊”与菲律宾政府停火，促使菲南从局部和平转向全面和平

最终协议确立了菲律宾政府与“摩解”之间的和平，但因“摩伊”拒绝接受该协议，菲南只能实现局部和平。自20世纪70年代末“摩伊”成立以来，其实力增长迅猛。90年代，“摩伊”自称有

¹ See Eliseo R. Mercado “OMI Culture Economics and Revolt in Mindanao: The Origins of the MNLF and the Politics of Moro Separatism”, in Lin Joo-jok and Vani S. ed., *Amel Separatism in Southeast Asia*,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84, p. 164

^④ See W. K. Che Man op. cit., pp. 147-148.

^⑤ See Eleanor D. Ictaan-Bang-oa op. cit., p. 158.

^⑥ Fr. Eliseo R. Mercado, Jr., “OMI Mindanao Peace Process”, 11 May 2007, <http://www.philippineupdate.com/frjun.htm>.

12万正规军和30万民兵。菲律宾军方认为“摩伊”力量介于8000~15000人之间。¹如不能将这武装力量纳入和平进程，菲南不可能实现全面和平。

为了推动菲律宾政府与“摩伊”的和解，中东穆斯林国家与其他伊斯兰会议组织成员国一道作出了巨大的努力。1997年9月，双方正式签署全面停火协议，就停火所需的军力部署和鼓励逃离家园者回家等问题达成一致。中东国家积极参与负责监督停火的国际观察团，以保证相关各方遵守停火协议。在国际观察团成员中，始终有来自利比亚的观察员。从2009年7月起，土耳其也将向菲南派出观察员。在推动菲南的持久和平方面，中东国家也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如2001年6月，菲律宾政府与“摩伊”签署的黎波里和平协议，会议得到利比亚方面的支持和推动，卡扎菲之子赛义夫·伊斯兰资助了为期三天的会谈，并说服“摩伊”在协议签署前数分钟同意在协议中不提自决问题。^④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菲南和平进程的演进，中东国家的作用在逐渐发生变化。在菲律宾政府与“摩解”谈判时期，中东国家在伊斯兰会议组织有关菲南问题的外交斡旋活动中扮演的是积极、主动和主导的角色，但到20世纪90年代后，中东国家逐渐淡出菲南问题，而让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本地的伊斯兰国家扮演主角。这种变化与中东局势、各相关国家的政策，以及摩洛哥穆斯林组织的变化都有关系。一方面是因为中东国家对长期悬而未决的冲突已有厌倦之情，中东本地区有更多、更重要的问题需要它们去关注，如伊拉克对科威特的入侵等。另一方面也由于“摩伊”和“摩解”竞相争夺在伊斯兰会议组织的正统地位，甚至引起中东国家的矛盾。长期流亡利比亚、沙特的密苏阿里得到这两个国家的大力支持，毕业于爱资哈尔大学的萨拉马特·哈希姆得到埃及的大力支持。密苏阿里最终保住了“摩解”在伊斯兰会议组织的地位，1979年2月，第十次伊斯兰国家外长会议承认“摩解”是菲律宾穆斯林的唯一代表，宣布对菲律宾穆斯林的所有援助都将通过该组织提供。^⑤伊斯兰会议组织帮助达成的最终协议“摩伊”也不接受，而且它对国际干预也持怀疑态度。直到2000年埃斯特拉达总统对“摩伊”发动全面进攻后，“摩伊”才认识到需要某种国际干预，以确保协议的具体实施。因此，2001年“摩伊”同意在伊斯兰会议组织的中介下恢复谈判。^⑥

不管中东国家在菲南和平进程中的作用有何变化，它们主张通过政治谈判实现菲南全面和平的原则立场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虽然“摩伊”与菲律宾政府还没有达成和平协议，但双方基本遵守停火协议，违反停火的事件不断减少，2003年仍有589起，2004年只有15起，截止到2008年5月只有1起。^⑦激战只是偶发现象，尽快实现全面、彻底的和平已成为相关各方的共识。

中东国家在菲南和平进程中发挥作用的原因

在菲南和平进程中，中东国家与菲律宾的关系并非一帆风顺。沙特和伊朗都曾暂时中止对菲律宾的石油供应，利比亚及其他伊斯兰国家也曾发出对菲律宾实行制裁的警告。但后来菲律宾政府不仅同意中东国家充任谈判调停者，而且高度评价它们的作用。如1996年最终协议成功实施后，拉莫斯总统致信伊斯兰会议组织秘书长哈密德·加比德，保证菲律宾会忠实履行协议，并公开感谢伊斯兰会议组织的斡旋。^⑧2009年7月16日，菲律宾总统阿罗约夫人在沙姆沙伊赫会见卡扎菲时，感谢卡扎菲

¹ Rizal G. Buendia “The GRP-MILF Peace Talks Quo Vadis?”, In Daljit Singh, Chin Kin Wah ed., *Southeast Asian Affairs* 2004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04, p. 206.

^④ See “Rebels in Philippines sign truce”, *Sunday Times* (Perth), 24 June 2001.

^⑤ See Sa'ad S. Khan op cit., p. 356.

^⑥ See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The Mindanao Peace Talks: Another Opportunity to Resolve the Moro Conflict in the Philippines* Special Report 131, 2005, p. 8.

^⑦ Jefferson Antiporda “Malaysia to Continue Mediating Peace Talks”, *Manila Times* (Philippines), 2 May 2008.

^⑧ See Sa'ad S. Khan op cit., p. 357.

及利比亚为菲南和平、安定作出的努力，并促请他为菲律宾的持久和平继续努力。¹ 双方关系变化反映了中东国家在菲南和平进程中的积极作用得到了充分肯定。

中东国家能在菲南和平进程中发挥重大作用，原因在于中东国家和菲律宾的各自实力地位、原则立场，以及菲律宾的灵活外交策略促成的相互间良性互动关系。

就中东国家来说，随着伊斯兰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其他国家穆斯林的命运也引起中东穆斯林的强烈关注。他们担心菲律宾穆斯林遭受政治、宗教迫害，希望本国政府出面维护这些穆斯林兄弟的利益。正是由于此原因，中东国家向“摩解”提供了政治、经济和军事支持，保障了“摩解”可以承受菲律宾政府施加的压力。就菲律宾和中东国家实力地位来说，双方实力极不均衡。作为一个实力较弱、国内矛盾尖锐的小国，菲律宾无法轻松应付获得中东国家支持的穆斯林反政府力量。更严重的是，菲律宾经济严重依赖中东穆斯林国家。首先，中东是菲律宾原油需求的主要来源地。1978年，沙特、科威特、伊朗、伊拉克四国向菲律宾供应了51.26万桶石油，占菲律宾石油进口总量的70%以上。1979年，上述四国对菲律宾原油出口量减为46.9万桶，但仍超过菲律宾原油进口量的70%。^④ 不要说切断对菲律宾的石油供应，即便是油价大幅上调都会对菲律宾脆弱的经济造成重大影响。1973年菲律宾尚有1470万美元的贸易盈余，1974年“石油武器”的影响开始显现，再加上其他因素的影响，菲律宾的贸易赤字猛增到7.646亿美元。^⑤ 因此，在处理与中东国家关系时，菲律宾必须避免激化矛盾，以免引起严重后果。正如一个观察家提醒的：“要是石油政治也扔进这口大锅，全国经济就会面临崩溃。”^⑥ 其次，菲律宾严重依赖中东的劳工市场。阿拉伯产油国是菲律宾劳务输出最重要的对象国，大批菲律宾医护人员、工程师、建筑工人等聚集于此。据统计，1983年，在中东国家工作的菲律宾人多达25万，寄回国的侨汇收入达9.55亿美元，相当于菲律宾商品出口额的21%。考虑到仅在1981年前三季度菲律宾就有3.6亿美元的贸易逆差，这些侨汇对于该国的贸易平衡就显得特别重要。1989年，在中东工作的菲律宾工人增加到50多万，侨汇金额超过20亿美元。^⑦ 在这种实力对比的情况下，菲律宾很难对中东国家的强烈要求置若罔闻。

尤为重要的是，中东国家在菲南问题上的原则立场是，既要维护摩洛哥穆斯林的利益，又要尊重菲律宾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从而为双方立场提供了契合点。第五次伊斯兰国家外长会议第18号决议得到菲律宾方面的好评，原因就在于会议拒绝了“摩解”的分离主义立场。马科斯总统特意发表公报，感谢会议接受了菲律宾领土完整是不可谈判的这一基本前提。^⑧ 中东国家虽然不时向菲律宾政府施压，但其原则立场始终没有变。如在“1976年的黎波里协议签署后的几年里，伊斯兰国家外长们继续支持摩洛哥人，但同时又避免与分离主义情绪联系在一起，也拒绝对菲律宾实行经济制裁。”^⑨ 也就是说，中东国家并未以支持分离主义来激化矛盾，而是主张用和谈化解矛盾，这一立场成为中东国家做和平谈判调停者的基础。

面对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菲律宾政府审时度势，采取了积极、主动、灵活的外交策略，与中东国家建立了良性互动关系。首先，欢迎中东国家到菲律宾实地了解真实情况，消除不实之词带来的负面影响。针对菲南发生对穆斯林集体屠杀的谣传，菲律宾政府欢迎中东国家和伊斯兰会议组织进行实地调查，因为用马科斯总统的话来说，就是“菲律宾没有什么要隐瞒的”。而到访的各个代表团均认

¹ See “The Leader of the Revolution Chairman of AU receives Philippines President”, Arabiā 2000, 17 July 2009.

^④ Dr Jose D. Ingles, *Philippine Foreign Policy*, Manila: Lyceum of the Philippines, 1982, p. 117.

^⑤ Lee Soo Ann ed., *Economic relations between West Asia and Southeast Asia*,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78, p. 131.

^⑥ Fred R von der Mehden, *Two Worlds of Islam: Interaction between Southeast Asia and the Middle East*,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1993, p. 57.

^⑦ *Ibid.*, pp. 30–31.

^⑧ See Moshe Yegar, *op. cit.*, p. 288.

^⑨ Fred R von der Mehden, *op. cit.*, p. 56.

为菲律宾不存在对穆斯林的迫害，更不要说集体屠杀，在此问题上澄清了事实真相。菲律宾学者认为，政府的这一做法为菲律宾赢得了利益：“尽管菲南冲突完全是菲律宾主权范围内的事务，但菲律宾允许伊斯兰会议组织做调停的诚意和开明最终获得了回报。1974年第五届伊斯兰会议清楚地承认，该问题必须在菲律宾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框架内予以解决。”¹ 其次，采取主动行动，化解外交难题。1980年11月17日，沙特政府通知菲律宾政府，因菲律宾在实施的黎波里协议时的消极态度，决定废除每天向菲律宾供油1万桶的合同。次年，马科斯总统夫人伊梅尔达在纽约与沙特代表会晤后，沙特取消了这一决定。^④ 1987年在第十八次伊斯兰国家外长会议召开前，“摩解”代表团出访中东各国，谋求各国支持“摩解”争取在伊斯兰会议组织的正式成员资格。该组织声称已获得48个成员国中35国的支持。菲律宾政府认为，这是一个极为严重的事态发展，按照巴解组织的先例，如获得伊斯兰会议组织正式成员资格，就意味着该组织承认“摩解”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为缓和这种紧张形势，菲律宾政府一方面争取与“摩解”和伊斯兰会议组织谈判，另一方面在外长会议召开的前两天，总统阿基诺夫人单方面宣布一条关于穆斯林自治区的法律。虽然“摩解”加以拒绝，但伊斯兰会议组织认为菲律宾政府显示出了诚意，因此拒绝给予摩解正式成员身份。^④ 再次，适时调整外交政策，争取阿拉伯国家的好感。长期以来，因依赖美国的经济援助、迫于美国的压力，菲律宾政府在中东问题上采取支持以色列、反对巴勒斯坦难民回归家园的政策。十月战争后，菲律宾政府调整对中东政策，谴责以色列对阿拉伯领土的武力占领，支持联合国安理会第242号决议，要求恢复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菲律宾先后与中东多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在伊朗、埃及、科威特、利比亚、沙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摩洛哥设立了大使馆。1975年，马科斯夫人展开中东穿梭外交，先后访问埃及、阿尔及利亚、沙特、突尼斯等国，获得相关国家不支持分裂菲律宾的承诺，加强了菲律宾与这些国家的外交关系。最后，加强与强硬派国家的交流，尽可能软化其态度。在中东国家中，利比亚和沙特是对“摩解”支持力度最大、对菲律宾态度最强硬的两个国家。利比亚曾呼吁对菲律宾展开圣战和经济抵制；沙特也宣布要对菲律宾实行石油制裁。菲律宾政府对利比亚和沙特两国做了许多争取工作，总统、总统夫人及政府要员多次出访利比亚和沙特，改善了与它们的关系，从而也影响了它们对待菲南问题的态度。利比亚和沙特都从单方面维护摩洛穆斯林的利益转为站在中间人的立场向冲突双方施压，既反对对菲律宾实行经济制裁，也反对摩洛穆斯林的分离主义立场，力图推进和平进程。一度全力支持摩洛穆斯林斗争的利比亚转变为菲南和平的坚决支持者，即使的黎波里协议的实施出现困难，卡扎菲仍表示希望实现和平，要努力“终结……这场战争，不给那些反对达成解决办法的人留下机会”^{1/4}。通过卓有成效的外交活动，菲律宾不仅减轻了菲南穆斯林问题上所承受的外部压力，也发展了与阿拉伯国家的经济关系。以菲律宾与沙特关系为例，两国贸易额从1973年的9030万美元增至1981年的10.1亿美元，沙特长期保持了菲律宾第三大贸易伙伴的地位。1982年3月马科斯总统访问沙特期间，还争取到沙特及其他中东银行5亿美元的循环信用额度贷款。^{1/2}

事实证明，菲律宾在菲南问题上的外交策略发挥了良好效果，将中东国家从外部压力变为维护国家统一、领土完整的积极力量，避免了菲律宾国家分裂的危险，有效地维护了菲律宾的国家利益。而正是这一外交策略，为中东国家在菲南和平进程中发挥建设性作用创造了前提条件，实现了中东国家与菲律宾双赢的结果。

(责任编辑：徐拓 责任校对：樊小红)

¹ Dr Jose D. Ingles op. cit., pp 118-119.

^④ See Moshe Yegar op. cit., p. 321.

^④ See Sa'ad S. Khan op. cit., pp. 356-357.

^{1/4} W. K. CheMan, op. cit., p. 139.

^{1/2} Dr Jose D. Ingles op. cit., pp 126-128.

The Issue of Pushtunistan: Its Origin, Cause and Effect

Yao Daxue & YanWei

pp. 5– 11

The issue of Pushtunistan is the dual product of history and political realities. The “Durand Agreement”, signed by British and India in 1893, is the historical roots of “Pushtunistan problem”. The India–Pakistan partition in 1947 gave birth to the “Pushtunistan problem”. With the change of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Pushtunistan problem”

became more and more complex, and now it has become a regional hot spot issue. “Pushtunistan problem” now has important impact not only on Afghanistan – Pakistan bilateral relations, the reconstruction of Afghanistan, and U. S. strategy in Afghanistan, but also on world security and regional stability.

The Role of the Middle East States in the Southern Philippine Peace Process

Meng Qingshun

pp. 11– 18

The Muslim countries in the Middle East played several kinds of roles as supporters of the Moro Muslim, negotiations intermediaries and promoters of comprehensive peace at different stages of peace processes in southern Philippine. They contributed to the successful shift from war situation to peace talks, from paper to actual peace talks and from

partial peace to comprehensive peace in the southern Philippines. The Middle East countries are able to play such a role based on their position of strength, principled stand and flexible interaction adopted by Philippine foreign policy and their good interrelations with Philippines.

Turkey and Greece: the Dispute on the Aegean Sea

Wu Chuanhua

pp. 18– 27

The Aegean Sea, surrounded by Turkey and Greece, is of high significance to both sides politically, economically, militarily and strategically. The Aegean Sea Dispute, connected with many other issues, such as the Cyprus dispute, has its deep historical origin and brings about long-term hostility between Turkey and Greece. The Aegean Sea Dispute includes a series of complicated issues: sovereignty over some islands, width of territorial sea, width of

territorial space, delimitation of continental shelf and demilitarization of some islands. The long-term dispute not only affects the Turkish–Greek relations but also threatens the regional peace and stability. Though the Turkish–Greek relations have gained détente since the end of 1990s, both countries wouldn't make a compromise on the Aegean Sea Dispute. “The Aegean Sea Cold War” hasn't ended up yet.